

# 民主增进与社会信任提升：对农民合作社 “意外性”作用的实证分析\*

赵 昶<sup>1</sup> 董 翀<sup>2</sup>

**摘要：**尽管农民合作社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其发挥经济功能，但其中蕴含的非经济作用也会在组织运行中“意外性”地显现出来。本文借鉴 SCP 分析范式，构建了“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成员民主、社会交往行为—合作社的民主与社会信任效应”的分析框架，利用 2018 年黄淮海农区 1020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合作社能否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能够增加成员的民主认知，进而促进成员民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加入合作社提升成员的特殊信任，并通过递移和跃迁强化普遍信任。具体而言，加入合作社可以使预期的农户民主参与概率提升 2.90%，普遍信任评分提升 4.34%。农民合作社具有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的作用。因此，要支持引导农民合作社发展从专业化、经济型向综合化、社会型转变，促其在乡村治理、农村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 民主 社会信任 处理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为了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2007 年 7 月中国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部法律主要借鉴欧美国家同行业生产者联合的思路，将农民合作社<sup>①</sup>定义为“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强调农民合作社的“专业性”，注重其经济功能。学界也多从经济角度考察农民合作社的组织绩效，肯定了农民合作社在农民增收以及农产品销售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蔡荣，2011；孔祥智，2015；杨丹、刘自敏，2017）。不过，由于规范性不够，再加上规模较小，大部分合作社在带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维视角下农民合作社功能发展演化机理与发展目标再定位研究”（项目编号：17BJY124）的阶段性成果。笔者衷心感谢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同山教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董翀。

<sup>①</sup>农民合作社发展日益多样化，既有生产型合作社，也有股份合作社、资金互助社、综合性合作社等，由于在制度安排、组织治理上，各类农民合作社都有很高的相似性，所以本文不作区分，统一使用农民合作社或合作社来表示。

动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十分微弱（潘劲，2011；张红宇，2016），单纯从经济方面看，合作社的发展效果令人沮丧（黄宗智，2018）。由于其未能很好实现促进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制度目标，再加上规范化程度不够、空壳社较多（苑鹏，2018），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社会环境明显恶化。

除经济功能外，作为扎根于农村社会、直接服务农民的草根组织，农民合作社还能社区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唐宗焜，2007）。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不仅强化了社区黏性，增强了成员之间的信任（孙艳华，2014），还内化了成员矛盾，减少了农民“上访”（潘劲，2014）。而且农民加入合作社越早、与合作社联系越密切，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积极性越高（韩国明、赵静，2017），合作社在村庄选举中的影响甚至高于宗族势力（韩国明、张恒铭，2015）。可见，随着城乡时代大变革中传统乡村共同体解构，农民合作社作为成员社会交往的平台，满足了农民发展生产之外的社区事务参与和社会交往的需求，其乡村共同体特征日益明显，制度设计的“意外性”作用逐渐显现。

成员参与、政治平等以及团结、信任等是共同体公共精神的内涵，民主与社会信任是自发性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关键（帕特南，2001）。农民合作社这种基于民主要求设计和运行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乡村共同体，对强化成员的民主意识和行为，培养成员的社会信任、团结等公共精神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近年来中央文件多次要求，发挥农民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农民合作社制度的顶层设计已不再强调其专业性、单纯追求经济功能。虽然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存在资本控制、凝聚力弱、民主层次低等问题，农民合作社未能在民主、社会信任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潘劲，2011；任大鹏等，2012；任大鹏、李蔚，2017），但考虑到中国城乡时代大变革中的农村社区正在重构（赵泉民、井世洁，2016），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种具有乡村共同体作用的农民合作交流组织（刘同山，2017），无疑能够发挥重要的非经济作用。不考虑农民合作社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单纯从经济角度对其进行评判，显然有失偏颇。农民组织化是中国农业农村转型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农民合作社实践效果备受质疑、发展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考察农民合作社在民主增进、社会信任提升方面的作用，对于全面客观认识农民合作社的价值，更好地推动农民组织化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以下拓展：其一，借鉴“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范式（以下简称SCP分析范式），搭建“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成员民主、社会交往行为—合作社的民主与社会信任效应”的理论框架，分析农民合作社民主效应、社会信任效应的发生机理，并对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拓展了既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其二，已有文献对农民合作社的非经济功能关注不多，有别于前人对其进行小样本统计分析及简单的回归分析，本文利用2018年黄淮海农区10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合作社的民主效应、社会信任效应进行严谨的计量分析，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农民合作社的民主效应、社会信任效应作用的机理；第三部分是数据、模型与变量介绍；第四部分对农民合作社的民主效应、社会信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检验民主认知、特殊信任分别对民主参与、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初步考察合作社的民主效应、社会信任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另一方面考虑内生性问题，对其民主效应和社会信任效应进行再考察；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二、理论分析：基于 SCP 分析范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再认识

产业组织理论的 SCP 分析范式指出，组织结构决定组织行为，而行为影响组织绩效。作为一种组织，农民合作社会引导成员行为，并最终产生组织绩效。因此，本文借鉴 SCP 分析范式，构建“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成员民主、社会交往行为—合作社的民主与社会信任效应”的分析框架，研究农民合作社对成员民主、社会信任影响的内在机理（如图 1）。

### （一）合作社的组织结构

从权威界定来看，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将合作社定义为“人们自愿联合起来的、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求的自治联合体。”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将农民合作社定义为“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规定合作社内设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其中代表普通成员利益的成员（代表）大会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看出，以“民办、民管、民受益”为宗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质是成员民主管理、互帮互助的组织平台，它既具有经济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其作用不仅涉及经济方面，还涉及社会、文化方面（张晓山，2014；苑鹏，2015）。农民专业合作社特殊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要求，无疑会影响成员的行为模式，进而带来一定的组织绩效。

### （二）成员民主、社会交往行为

在合作社中，成员的行为模式是由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决定的。国内外关于合作社运行规则的界定，均包含对成员民主参与及其他社会交往行为的说明。国际合作社联盟 1895 年提出的“罗虚代尔原则”规定民主管理、一人一票，且要求重视成员教育，1995 年提出的“曼彻斯特原则”进一步细化了包括民主控制，教育、培训和宣传，自愿开放以及关心社区等在内的七条原则。中国 2018 年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成员享有参与成员大会的权利，并通过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参与民主管理；成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且出席人数要达到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合作社要向成员提供经济、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社会化服务。在农村熟人社会，参与成员大会、接受各类社会化服务，显然也是一种社会交往。

虽然实践中，中国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社没能完全按照既定的行为规则运行，但是因植根于农村熟人社会，为了增强组织的合法性和凝聚力，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坚持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并关心社区、加强成员联系（潘劲，2014）。加入合作社后，成员不仅在生产经营方面享受到合作社提供的各种服务，还通过参与合作社组织的文化培训、养生讲座、节日联欢等具有社区性质的活动，走出私人家庭生活，融入公共乡村社区（张纯刚等，2014）。借助合作社这一合作交流平台，农民参与民主实践的机会得以增加，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大大加强（任大鹏等，2012）。因此，可以预期，农民合作社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行为会增加成员的民主认知，提升其民主技能，社会交往行为则会增强成员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进而影响其社会信任。

### （三）合作社的民主与社会信任效应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会直接影响成员的民主认知和社会交往，还会对成员的民主参与和社会信

任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民主促进作用看，合作社作为民主的大学校（张晓山，2014），具有教化、教育的功能。在参与合作社内部民主管理的过程中，成员的民主意识得到了潜移默化的加强，民主习惯受到了培养和锻炼（潘劲，2014）。与此同时，合作社组织内部的民主活动培育了成员的民主认知与技能（帕特南，2001；王绍光，2009），而认知是行动的先导，民主认知的提升会增加民主参与的可能性（帕特南，2001）。此外，合作社对民主行为的正向反馈，能改变成员的政治冷漠感，增强投票的信心与效能感（仝志辉，2002）。总之，成员通过合作社内部的民主行为掌握了如何行使民主权利，获得了民主参与的信心，进而提升了参与村庄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发现，加入合作社对成员民主认知、民主参与和村庄民主建设都有较强的作用（Mooney，2010；潘劲，2014；韩国明、赵静，2017）。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民主效应，加入合作社能增加成员的民主认知，并强化其对村庄事务的民主参与。

社会信任有基于血缘、地缘以及对同事和亲朋好友的特殊信任（韦伯，1995），也有对整个制度或陌生人的普遍信任（Giddens，1984）。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社区共同体属性的合作交流平台，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在密切联系中促进了成员对身边熟人的特殊信任，还通过信任的递移和跃迁提升了成员对社会的普遍信任。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强了成员与周围熟人之间的交往，直接增加了彼此的信任。随着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换增加、熟悉程度加强，信任的桥梁得以搭建（Fischer，2013）。Jarvenpaa（1999）从全球随机抽取350名硕士生分组参与为期六周的网上交流实验，发现最初认识时积极自我介绍，并保持相互沟通的组信任水平更高，表明沟通能够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了解，产生信任。随着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空闲时间的减少，彼此之间因缺乏交流导致的疏离感在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变得十分脆弱。桑内特（2014）将这种现象称为“公共人的衰落”，他认为人们需要的不是隔离在一个个马赛克式拼接的孤岛中，而是需要一个有着积极交往的公民社会。作为充满阳光和温暖的福利小屋，合作社营造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氛围（黄祖辉、邵科，2009），通过互帮互助和业务往来，增加了成员与身边熟人之间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沟通联系，从而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

另一方面，合作社成员与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可以通过递移和跃迁转变成对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首先，信任具有“递移性”。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现实考量，熟人关系是社会信任递移的中介变量（费孝通，2008；罗家德、李智超，2012）。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交流培训、协会活动等，形成了成员与所在社区非成员互动交流的乡村公共空间，给他们提供了熟悉的可能（张纯刚等，2014）。通过成员与所在社区非成员熟人关系的递移，建立起了彼此之间社会资本的弱关系（罗家德、李智超，2012），延长了信任传递的链条。其次，信任具有“跃迁性”。成员与熟人间特殊信任建立的成功经验可以跃迁到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中去（伍麟等，2016）。对信任持有积极期望的人更愿意相信陌生人（Uslaner，2002；帕特南，2011），而且个体所嵌入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其对社会的普遍信任（罗家德、李智超，2012）。在合作社中的社会交往行为让成员感受到了来自周围人的善意，增加了对信任的乐观期望，这种积极的态度有利于他们对社会信任水平持良性预期（帕特南，2011）。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社会信任效应，加入合作社能增强成员的特殊信任，进

而提升普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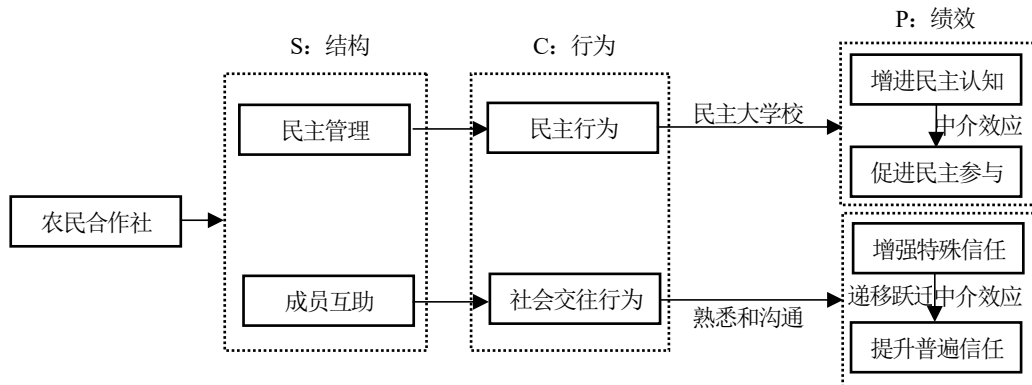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合作社民主增进和社会信任提升的机理

###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退出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维视角下农民合作社功能发展演化机理与发展目标再定位研究”于2018年1~3月在黄淮海农区联合开展的农户调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农户生活习惯的相似性以及春节期间年轻农民返乡较多的情况，课题组特意选择春节期间进行农户问卷调查。首先，课题组在黄淮海农区的318个县（区、市）中随机抽取20个样本县（区、市），并对个别样本县（区、市）进行调整以平衡空间分布，最终选定6省的20县（区、市）作为调查区域<sup>①</sup>。其次，在每个样本县（区、市）分别随机选定2个乡镇、每个乡镇2个村，然后每个村随机抽取10~20户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受访者一般是户主或了解家庭情况、代表家庭做决策的“主事人”。在春节期间，受访家庭成员相对齐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样本选择偏差。本次调查问卷由课题组的10位调查员一对一入户访谈完成，个别涉及到家庭层面的问题，鼓励其他家庭成员参与讨论和进行补充。10位调查员主要由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博士、硕士生组成，均经过严格的培训。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选定变量以后，剔除6户村主任、村支书的样本，最终确定1020个有效农户调查样本。

#### (二) 模型设定

理论分析表明，加入合作社可以增强民主认知，进而促进民主参与，并通过提升特殊信任，加强普遍信任。本文首先对民主认知、特殊信任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来初步考察农民合作社的民主效应与社会信任效应。然后，考虑到农民是否加入合作社存在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TEM）对其民主效应、社会信任效应进行再考察。为保证模型可识别，处理效应模型要求选择方程

<sup>①</sup> 分别是天津市宁河区，江苏省的邳州市、沭阳县，山东省的平度县、东平县、鄄城县、成武县、莒南县，河南省的建安区、襄城县、太康县、内黄县、温县，河北省的肥乡县、隆尧县、迁西县、黄骅市、清苑区，安徽省的利辛县、阜南县。

中至少包含一个工具变量，本文选取“亩均产值是否高于样本平均值”<sup>①</sup>作为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的工具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亩均产值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通过加入合作社来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且加入合作社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生产效率改善，进而提升亩均产值，因此亩均产值的高低与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有正相关性，但它对农民的民主参与、普遍信任没有显著影响。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也验证了上述结果。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步骤分为两个阶段<sup>②</sup>：第一阶段是选择方程的回归，即对农户选择是否加入合作社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估计；第二阶段是效应方程的回归，即测度农户加入合作社对民主参与和普遍信任的影响。第一阶段估计中，受访人是否加入合作社的选择可表示为：

$$C_i^* = Z_i\beta + \mu_i, \quad C_i = \begin{cases} 1, & C_i^* > 0 \\ 0, & C_i^* \leq 0 \end{cases} \quad (1)$$

(1) 式中，若农户选择加入合作社则  $C_i=1$ ，否则  $C_i=0$ 。 $Z_i$  是影响农户加入合作社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因素， $\mu_i$  是随机误差项， $\beta$  是待估系数向量。第二阶段估计中，效应方程可表示为：

$$D_i = X_i\lambda_1 + C_i\lambda_2 + \varepsilon_{1i} \quad (2a)$$

$$T_i = Y_i\alpha_1 + C_i\alpha_2 + \varepsilon_{2i} \quad (2b)$$

(2a) 式和 (2b) 式中，被解释变量  $D_i$  和  $T_i$  分别表示民主参与和普遍信任变量， $X_i$  和  $Y_i$  是一系列影响农户民主参与、普遍信任的因素， $\varepsilon_{1i}$  和  $\varepsilon_{2i}$  为效应方程的误差项。

### (三)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一是民主变量。为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民主效应，本文从民主认知、民主参与两个方面来测度民主。民主认知即人们对于民主程序性、实质性的了解（李路路、王煜，2016），它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们对于民主的关注度，并对民主参与意愿产生影响（帕特南，2011）。对农户而言，村委会选举是农村民主最为直接的形式，因此调查员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你是否知道村委会的产生程序（流程）？”来考察受访者的民主认知。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成效的主要判断标准之一，现有研究也大都将是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作为农户民主参与的衡量指标（苑鹏、白描，2013；韩国明、赵静，2017）。本文通过询问“上次村委会选举，你家有人去投票吗？”来考察样本家庭的民主参与情况。

二是社会信任变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信任效应体现在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提升。对本文而言，特殊信任是指农户对亲朋好友等熟人的信任，而普遍信任则是对非特定群体的信任。对社会信任的测量主要是借助李克特量表，让受访者报告自己的信任等级。因此，本文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绝大多数亲戚、朋友等熟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并让其从“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5”五个等级选项中选择，作为衡量特殊信任的指标。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并让其从“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5”五个等级选项中选择，作为衡量普遍信任的指标。

<sup>①</sup> 比较农户亩均产值与样本总体亩均产值，若农户亩均产值高于样本均值，则工具变量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

<sup>②</sup> 限于篇幅，关于处理效应模型（TEM）的详细论述，参见陈强，2014：《高级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关键解释变量。本文关注的是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成员民主、社会信任的影响，因此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你家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了吗？”来考察该农户的合作社参与情况。考虑到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问题比较严重（苑鹏，2018），以直接询问农户的方式来获取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数据，更能真实地反映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情况。由于户主或家里的“主事人”是合作社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因此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来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民主增进、社会信任提升作用具有合理性。

3.控制变量。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并借鉴现有研究（孙艳华，2014；刘同山，2017；Kumar et al., 2018），本文将控制变量<sup>①</sup>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户主或“主事人”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等。二是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比例、家里是否有党员、是否想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是民主参与的基本动机（苑鹏、白描，2013），想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农户，其生产生活重心更多地在本村，因此更在意村庄事务，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积极性更高，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三是社会交往情况，包括城市社会资本、社区互助、是否外出打工、是否上网等。

社会交往情况会影响社会信任。一方面是基于信任的“相对易损性”（Luhmann, 1993；王绍光、刘欣，2002），个人社会交往情况会影响自身的社会资本（包括收入与财富、稳定的工作、权力、社会网络等），而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其相对易损性越低，也就是说冒险相信陌生人的成本越低。另一方面是基于信任的“认识发生论”（王绍光、刘欣，2002），社会信任受过去认知经验的影响，对一个事物的认知好坏会影响其信任水平（Fischer, 2013），社会交往情况显然会改变农户的认知经验。而且，互联网使用和现代城市文明的接触，可能会强化农户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行为。总之，城市社会资本、社区互助、是否上网等均可能会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差异。上述各变量及其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民主参与	上次村委会选举，你家有人去投票吗：没有=0；有=1	0.595	0.491
民主认知	你是否知道村委会的产生程序：否=0；是=1	0.463	0.499
普遍信任	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你同意吗：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说不上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5	3.816	1.141
特殊信任	绝大多数亲戚、朋友等熟人都是可以信任的，你同意吗：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说不上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5	3.926	1.010
年龄	受访者接受调查时的年龄（岁）	53.819	11.356
性别	女=0；男=1	0.684	0.465
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报告的受教育年限（年）	6.794	4.558
健康状况	很健康=1；比较健康=2；一般=3；比较差=4；很差=5	1.997	1.079
家庭劳动力比例	家庭16~65岁劳动力人数与家庭总人口数的比值	0.022	0.039
家里是否有党员	否=0；是=1	0.178	0.383

<sup>①</sup> 在处理效应模型中，控制变量的选择大都是基于选择方程的，当然也可以基于效应方程，本文将影响是否参与合作社的变量同时作为效应方程的控制变量。

是否想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你家是否想多种一些地：否=0；是=1	0.323	0.468
城市社会资本	与别人相比，你家人在城里认识的人数如何：偏少=1；差不多=2；偏多=3	1.871	0.861
社区互助	村里人生产生活中相互帮忙多吗：很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很多=5	3.435	0.995
是否外出打工	近五年是否外出打工：否=0；是=1	0.294	0.456
是否上网	否=0；是=1	0.460	0.499
是否加入合作社	否=0；是=1	0.106	0.308

#### (四) 描述性分析

表1给出了样本总体的变量均值以及标准差。总体来看，样本地区约有10.6%的农户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远低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近半数”，这可能与样本地区的选择有关，也可能是现实中虚假合作社较多造成的（苑鹏，2018）。样本农户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达到59.5%，有46.3%的受访者知道村委会的产生程序。普遍信任的均值为3.82，即受访者认为绝大多数人还是可以信任的。特殊信任的均值为3.93，略高于普遍信任，表明大部分受访者更信任亲戚朋友等熟人。此外，受访者的平均年龄约为53.82岁，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46.0%。

表2给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与非成员各变量的均值差异。与非成员相比，合作社成员的民主认知、民主参与均值分别高0.262和0.283，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均值分别高0.372和0.279，以上差异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直观地说明，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成员与非成员的个体特征差异基本不明显，但成员的健康状况相对更好。值得注意的是，与非成员相比，成员的城市社会资本和社区互助都显著更多，表明合作社强化了农民的社会交往，与前文理论分析部分相一致。上述结果初步给出了成员与非成员的差异，要得出加入合作社对民主和社会信任更为准确可信的影响，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计量分析。

表2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与非成员各变量的均值差异

变量	成员	非成员	差异
民主参与	0.849 (0.03)	0.565 (0.02)	0.283***
民主认知	0.698 (0.04)	0.435 (0.02)	0.262***
普遍信任	4.148 (0.09)	3.776 (0.04)	0.372***
特殊信任	4.176 (0.09)	3.897 (0.03)	0.279***
年龄	53.990 (1.02)	53.798 (0.38)	0.192
性别	0.694 (0.04)	0.683 (0.02)	0.011
受教育年限	7.454 (0.27)	6.716 (0.16)	0.738
健康状况	1.722 (0.10)	2.029 (0.04)	-0.307***
家庭劳动力比例	0.013 (0.00)	0.023 (0.00)	-0.009**
家里是否有党员	0.268 (0.04)	0.168 (0.01)	0.101***
是否想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0.388 (0.05)	0.315 (0.02)	0.074
城市社会资本	2.120 (0.08)	1.841 (0.03)	0.279***



社区互助	3.787 (0.09)	3.394 (0.03)	0.393***
是否外出打工	0.268 (0.04)	0.297 (0.02)	-0.029
是否上网	0.481 (0.05)	0.457 (0.02)	0.024
样本数	108	912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 四、实证分析

##### (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民主、社会信任效应：考虑中介效应

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民主效应。民主认知是民主参与的关键前提，不关心、不了解民主选举程序的人，其民主参与的可能性也不会太高（帕特南，2011）。因此民主认知可能充当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影响民主参与的中介变量，应当对相关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温忠麟、叶宝娟（2014）提出的检验程序对民主认知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首先，不考虑民主认知变量，直接将民主参与变量作为结果变量，将是否加入合作社和各控制变量一起纳入回归方程，发现是否加入合作社对民主参与有正向影响，如表 3 第 1 行所示，系数为 0.466。然后，进行 Hayes（2009）提出的联合显著性检验，一方面将民主认知对是否加入合作社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 Probit 回归，得到是否加入合作社的系数为 0.459（表 3 第 2 行），说明合作社能够让成员获得更多的民主认知，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王绍光，2009；潘劲，2014）。另一方面，控制是否加入合作社变量，将民主参与对民主认知及各控制变量一起进行 Probit 回归，结果如表 3 第 3 行所示，民主认知对民主参与的影响系数为 1.051<sup>①</sup>，说明在控制是否加入合作社时，民主认知仍对民主参与有正向影响。上述结果都通过了给定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民主认知充当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影响民主参与的中介变量。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会直接影响成员的民主参与，还会通过强化民主认知进而提升民主参与的概率（苑鹏、白描，2013），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假说 1 得到初步证实。

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信任效应。与民主效应类似，加入合作社产生的特殊信任，可能会通过递移、跃迁转变为普遍信任。因此需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考察特殊信任是否充当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影响普遍信任的中介变量。因社会信任变量值为有序数据，故先将普遍信任对是否加入合作社和各控制变量一起进行有序 Probit 回归，表 3 后 4 行的估计结果表明，是否加入合作社对普遍信任有正向影响，系数为 0.397。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是否加入合作社对特殊信任有促进作用，系数为 0.260；控制是否加入合作社变量后，特殊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影响系数为 0.287。上述结果都通过了给定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以上分析表明，特殊信任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普遍信任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会直接改善成员的普遍信任状况，还会通过增强特殊信任，间接提升普遍信任。假说 2 也得到初步证实。

表 3 民主认知、特殊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	系数说明	效应分析
------	------	------	------

<sup>①</sup>在一些情况下，Probit 模型的估计系数可能大于 1，详见 Stata 官方给出的解释：<https://www.stata.com/support/faqs/statistics/marginal-effect-greater-than-1/>。

民主参与对是否加入合作社回归	0.466*** (0.175)	$c$ ：是否加入合作社	总效应
民主认知对是否加入合作社回归	0.459*** (0.151)	$a$ ：是否加入合作社	中介效应：
民主参与对民主认知回归（控制合作社变量）	1.051*** (0.103)	$b$ ：民主认知	$a \times b$
其中是否加入合作社的系数	0.398** (0.179)	$c'$ ：是否加入合作社	直接效应
普遍信任对是否加入合作社回归	0.397*** (0.125)	$c$ ：是否加入合作社	总效应
特殊信任对是否加入合作社回归	0.260** (0.120)	$a$ ：是否加入合作社	中介效应：
普遍信任对特殊信任回归（控制合作社变量）	0.287*** (0.039)	$b$ ：特殊信任	$a \times b$
其中是否加入合作社的系数	0.350*** (0.122)	$c'$ ：是否加入合作社	直接效应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参数的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此处不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汇报，但各回归方程均包含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交往情况等控制变量。

## （二）农民合作社的民主、社会信任效应再考察：考虑内生性

由于未能考虑合作社参与的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没能考虑到民主认知更强、民主参与更积极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更多的农民可能更愿意加入合作社，上述中介效应检验只是粗略地验证了加入农民合作社具有民主增进和社会信任提升作用，但其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不够。考虑内生性问题，并对上述中介效应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借鉴刘同山（2018）的思路，采用处理效应模型（TEM），将农户的民主参与、普遍信任对是否加入合作社进行估计。

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Wald检验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选择方程和效应方程相互独立的原假设， $\rho$ 为负数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加入合作社对民主参与、普遍信任的影响受很多可观测因素与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例如政治兴趣浓厚、自身素质较高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加入合作社，由自选择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选择性偏误，故对民主参与、普遍信任采用处理效应模型估计是有效的。另外，工具变量对“是否加入合作社”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对于民主参与、普遍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估计结果表明：①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相比，加入合作社的家庭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更高，如表4第3列所示，估计系数为0.417，这意味着加入合作社能让成员参与村委会投票的概率提升41.7%，合作社有显著的民主增进作用，假说1得到了进一步证实；②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更认同“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这一说法，如表4第5列所示，估计系数为1.035，表明加入合作社能让农民的普遍信任提升一个等级，这意味着加入合作社能显著提升社会信任，假说2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表4 农民合作社对民主参与、普遍信任的影响：处理效应模型回归

	选择方程： 是否加入合作社	效应方程： 民主参与	选择方程： 是否加入合作社	效应方程： 普遍信任
年龄	0.064 (-0.351)	0.244*** (-0.078)	0.100 (-0.356)	0.563*** (-0.196)
性别	-0.032 (-0.139)	0.050 (-0.032)	0.023 (-0.141)	0.185** (-0.081)
受教育年限	0.005 (-0.012)	0.009*** (-0.003)	0.004 (-0.017)	-0.009 (-0.008)
健康状况	-0.097 (-0.064)	-0.026* (-0.014)	-0.117* (-0.065)	-0.019 (-0.036)
家庭劳动力比例	-10.571 (-6.621)	0.241 (-0.394)	-13.027* (-6.981)	0.562 (-0.985)

民主增进与社会信任提升：对农民合作社“意外性”作用的实证分析

家里是否有党员	0.166 (-0.149)	0.110*** (-0.038)	0.160 (-0.150)	0.039 (-0.096)
是否想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0.233* (-0.132)	-0.053* (-0.032)	0.236* (-0.132)	0.002 (-0.078)
城市社会资本	0.153** (-0.074)	0.021 (-0.018)	0.151** (-0.073)	-0.048 (-0.043)
社区互助	0.190*** (-0.065)	0.009 (-0.015)	0.195*** (-0.064)	0.024 (-0.038)
是否外出打工	0.145 (-0.152)	-0.149*** (-0.034)	0.196 (-0.152)	0.038 (-0.086)
是否上网	-0.019 (-0.149)	0.063* (-0.034)	-0.023 (-0.150)	-0.166* (-0.085)
工具变量	0.418*** (-0.133)	—	0.464*** (-0.126)	—
是否加入合作社	—	0.417** (-0.164)	—	1.035*** (-0.285)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3.437** (-1.521)	-0.703** (-0.323)	-3.683** (-1.528)	1.072 (-0.807)
$\rho$		-0.405		-0.345
$\sigma$		0.445		1.119
方程独立性 Wald 检验		3.570*		6.160**
对数似然值		-852.686		-1803.271
样本数	1014	1014	1018	1018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参数的稳健标准误。

基于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加入合作社对民主参与、普遍信任的平均处理效应（ATE）。通过分别预测样本农户全部加入合作社与全部不加入合作社时民主参与的变量均值，得出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民主参与的平均处理效应，使用同样方法得出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普遍信任的平均处理效应。表5的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可以让农户民主参与的可能性提升2.90%，对普遍信任程的评分提升4.34%，二者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总之，农民合作社确实具有较强的民主增进和社会信任提升作用。

表5 农民合作社对农户民主参与、普遍信任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		ATE	t 值	变化 (%)
	是 (成员)	否 (非成员)			
民主参与	0.603 (0.276)	0.586 (0.213)	0.017***	5.900	2.901
普遍信任	3.946 (0.361)	3.782 (0.271)	0.164***	23.449	4.337

注：\*\*\*表示估计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民主参与概率的变化 (%) = 民主参与的 ATE ÷ 非成员民主参与的概率 × 100%；普遍信任评分的变化 (%) = 普遍信任的 ATE ÷ 非成员对普遍信任的评分 × 100%。

##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城乡大变革的背景下，传统乡村共同体解构给农户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作为重要的乡村经济社会组织，农民合作社除了发挥制度设计所强调的经济功能外，在民主、社会信任方面的作用也“意外性”地显现。本文借鉴 SCP 分析范式，构建了“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成员民主、社会交往行为—合作社的民主与社会信任效应”的分析框架。农民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影响了成员的民主和社会交往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其民主习惯，增加了沟通了解，从而对成员的民主和社会信任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黄淮海农区 1020 户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能增加成员的民主认知，进而促进成员民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加入合作社提升成员的特殊信任，并通过递移和跃迁强化普遍信任。本文进一步利用处理效应模型，考虑内生性和选择性偏误，再次证实了合作社能增进民主参与、提升普遍信任。ATE 估计结果显示，加入合作社使预期的农户民主参与概率提升 2.90%，普遍信任评分提高 4.34%。因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民主效应，表现为加入合作社增强了民主认知和民主参与，并通过民主认知对民主参与的中介效应，实现了民主效应加成。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社会信任效应，表现为加入合作社提升了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并通过特殊信任的递移和跃迁，实现普遍信任的强化。

上述结论主要有三方面的政策启示。一是要合理引导合作社重视民主治理和社会效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及示范社评定时，当前实践标准主要是合作社的经营面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等经济指标，但合作社本身具有促使成员满意、治理民主、成员幸福的能力，其背后蕴含的合作理念和人文精神是决定合作社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张晓山，2014），因此还应通过扩展规范化评定指标来引导其进行社会文化建设。二是要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适用范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范围不应局限于专业合作社，还应在为农服务的原则下，增强法律法规的灵活性，为综合性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三是要促进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合作社能否将服务扩展到生活领域，实现社会价值，关键取决于其发展质量。因此应当加大监管力度，逐步清理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虚假合作社。

#### 参考文献

1. 蔡荣，2011：《“合作社+农户”模式：交易费用节约与农户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 1 期。
2. 费孝通，2008：《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
3. 韩国明、张恒铭，2015：《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村庄选举中的影响效力研究——基于甘肃省 15 个村庄的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4. 韩国明、赵静，2017：《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5. 黄宗智，2018：《中国农业发展三大模式：行政、放任与合作的利与弊》，《中国乡村研究》第 1 期。
6. 黄祖辉、邵科，2009：《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7. 孔祥智，2015：《合作社是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农民合作社》第 12 期。
8. 李路路、王煜，2016：《中国民众的民主认知与民主支持》，《江苏社会科学》第 6 期。
9. 理查德·桑内特，2014：《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0. 刘同山，2017：《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幸福效应：基于 ESR 模型的计量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 4 期。
11. 刘同山，2018：《农地流转不畅对粮食产量有何影响？——以黄淮海农区小麦生产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 12 期。

12. 罗伯特·D·帕特南, 2001: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等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3. 罗伯特·D·帕特南, 2011: 《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刘波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罗家德、李智超, 2012: 《乡村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信任机制初探——以一个村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例》, 《管理世界》第10期。
15. 马克斯·韦伯, 1995: 《儒教与道教》, 洪天富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6. 潘劲, 2011: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数据背后的解读》, 《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17. 潘劲, 2014: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社区治理》,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第7期。
18. 任大鹏、李琳琳、张颖, 2012: 《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凝聚力和离散力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19. 任大鹏、李蔚, 2017: 《农民专业合作社梯次民主现象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20. 孙艳华, 2014: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信任关系研究: 基于湖南省生猪行业的调研与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第7期。
21. 唐宗焜, 2007: 《合作社功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研究》第12期。
22. 仝志辉, 2002: 《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 《社会学研究》第1期。
23. 王绍光, 2009: 《“公民社会”祛魅》, 《绿叶》第7期。
24. 王绍光、刘欣, 2002: 《信任的基础: 一种理性的解释》, 《社会学研究》第3期。
25. 温忠麟、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
26. 伍麟、曹婧甜、万仞雪, 2016: 《信任的“跃迁”及其限度》,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27. 杨丹、刘自敏, 2017: 《农户专用性投资、农社关系与合作社增收效应》, 《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28. 苑鹏, 2015: 《欧美农业合作社的实践创新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学习与实践》第7期。
29. 苑鹏, 2018: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困境与思考——来自8省12县614家合作社问卷调研》, 《中国合作经济》第8期。
30. 苑鹏、白描, 2013: 《福利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六县487户农户的问卷分析》, 《理论探讨》第6期。
31. 张纯刚、贾莉平、齐颀波, 2014: 《乡村公共空间: 作为合作社发展的意外后果》,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32. 张红宇, 2016: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农村工作通讯》第19期。
33. 张晓山, 2014: 《关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 《中国合作经济》第10期。
34. 赵泉民、井世洁, 2016: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学术论坛》第4期。
35. Fischer, C., 2013,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in European Agri-Food Chain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18(2):208-218.
36.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37. Hayes, A.F., 2009, “Beyond Baron and Kenny: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6(4):408-420.
38. Jarvenpaa, S.L. and D.E. Leidner, 1999, “Communication and Trust in Global Virtual Team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0(6):791-815.

- 39.Kumar, A., S. Saroj, P.K. Joshi and H. Takeshima, 2018, “Does Cooperative Membership Improve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Smallholder Dairy Farmers in Bihar, India.”, *Food Policy*, 75: 24-36.
- 40.Luhmann, N., 1993,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41.Mooney, P. H., 2010. “Democratizing rur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friction, sustainable struggle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Rural Sociology*;69(1):76-98.
- 42.Uslaner, E.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sup>1</sup>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sup>2</sup>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责任编辑：曙 光)

##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Social Trust Improve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Unexpected” Effec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Zhao Chang Dong Chong

**Abstract:** Although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farmers’ cooperative system design is to enable farmers’ cooperatives to play their economic functions, the non-economic effects can also appear “unexpectedly” in th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SCP paradigm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cooperatives - member democracy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 democracy and social trust effect of cooperatives”.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1020 farmer households in Huang-huai-hai Agricultural Area in 2018,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whether farmers’ cooperatives can enhance democracy and social tru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operatives can increase members’ democratic cognition and promote members’ enthusiasm for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Moreover, joining cooperatives can enhance members’ special trust and strengthen general trust through the transfer and transition. Specifically, joining a cooperative can increase the expected probability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by 2.90% and the general trust by 4.34%. Farmers’ cooperatives can promote democracy and enhance social trust. Therefore, we must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from specialization to integration and socialization, and encourage cooperatives to play roles in rural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rural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Farmers’ Cooperative; Democracy; Social Trust; Treatment Effect Model